

## 【第二章】 經濟行為與道德目的

人除了道德本性之外還有血肉之軀，有生存的需要就有欲望，欲望是一種生命力，創造了多采多姿、無奇不有的花花世界，沒有理想、沒有夢想、沒有願望的人生就像一個枯燥的空架子，但是欲望若不由道德來約束，勢必像橫流氾濫，一發不可收拾，所以對於「欲望」不能去忽視它。

人的欲望無窮，商機也無窮，這是促進經濟進步的原動力。經濟好壞有許多因素影響，而常有人認為儒家道德對經濟沒有幫助，甚至是有礙經濟發展，這是因為我們總是認為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收益就是經濟的最終目的，當我們以此做為標準的時候，價值觀也就不同了。當我們想著追逐最大效益所獲得的快樂時，便會竭盡所能，甚至不擇手段，往往忘記了是否能夠承受得不到的痛苦，或者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此時價值觀上的扭曲，容易引導我們走到人生錯誤的方向。由儒家道德的思想去思考經濟行為的目的，便有不同的角度切入，來經營出自己最有價值的人生。

### 第一節 恆心與恆產

#### 一、君子無恆產亦有恆心

人性本善，但人無法坦露本心而自在生活的原因是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以及環境因素影響，在環境這個因素當中，孟子也注意到經濟生活的影響。孟子說：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梁惠王上）

孟子的意思是說：沒有永久保有的產業，卻有經常向善的心志，只有士才能做得到。君子能夠如此，是因為君子明白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天下沒有任何產業是可以永久私自保有的。古人常說：「人爵哪有天爵貴，利名哪有道名高？」就像孟子所說：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告子上）

天爵的意思是世界上最尊貴的是我們的良心，世間外在的名位、富貴、權力

等等總有一天會消逝的是人爵。孟子認為古時候的人(堯、舜)修養自己的品德，人爵自然而然地也隨之而來，但是外在的榮華富貴，並不是他真正所要的。例如釋迦摩尼佛貴為印度王朝的王子，但由於他對生命的了透而放棄了他的人爵王位，而走向修行之路，最後受到世世代代永久的信仰，這樣的貴就是天爵之貴。現代的人修養品德，到了自己發達的一天，卻被外在的權貴迷惑，很容易忘記了本身就有的良貴，忘了自己是誰，「權力使人心腐化」就是這個道理。孔子也說過這麼一句話：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衛靈公篇)

君子為了生活君子寧願耕作，有時候收成不好而餓肚子也沒關係，因為君子所求的不是恆產，在乎的是心中的道、生命的要義。孟子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

大丈夫居仁由義，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外在環境因素亦不能改變君子的道德堅持，君子所追尋的，不是富貴、名利、權位可以攀附與形容。無論是貧窮或富有，都能夠對自己心性的加以把持。君子除了著重自己的道德修養之外，對自己的生存條件也要負責任，並不是苦讀聖賢書就可以的，清初唐甄在「養重」一文中說：

苟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求之，必為小人矣。我之以賈為生者，人以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sup>30</sup>

唐甄宗主王陽明之學，但晚年轉而經商。此文正是說明他的以賈為生是為了保全自己人格的尊嚴。清朝沈垚說：

衣食足而後責以禮節，先王之教也。先辦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餓死二字如何可以貴人？豈非宋儒之教高於先王而不本於人情乎？宋有祠祿可食，則有此過高之言。元無祠祿可食，則許魯齋先生有治生為急之訓。<sup>31</sup>

<sup>30</sup> 《潛書》上篇下。轉引參閱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九十三年），第九十九頁。

<sup>31</sup>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九，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一九五》，新文豐出版。轉引參閱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九十三年），第一百零一頁。

又說：若魯齋治生之言則實儒者之急務。能躬耕則躬耕，不能躬耕則擇一藝以為食力之計。宋儒復生於今，亦無以易斯言。<sup>32</sup>

沈垚的話在清代儒家中有代表性，他所強調的是士必須在經濟生活上首先獲得獨立自足的保證，然後才有可能維持個人的尊嚴和人格。君子對於恆產還有更深刻的感受，孟子說：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離婁上）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下）

有預期之外的讚賞，也有求好心切的反而毀了，我們行為後果的好壞無法準確計算和掌握，自己都不能規劃，所以沒有說一定要如何如何，只要所做之事合乎道義，活在當下就是了。君子看透這一點，生命的志向已經和常人不同，此生所追尋的必然也不一樣。就算為了生活從商做買賣，不會把累積財富看成首要，也不會把錢財得失看得比命還重要，一樣可以做道德實踐，所以說，君子無恆產亦有恆心。

## 二、百姓無恆產則無恆心

一個懂得追求超越生命價值的君子都需要為自己活下去的生存條件負責，何況是一般單純只求平安幸福的老百姓。美國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sup>33</sup>曾經提出人性五大基本需求：1.生理的需求 2.安全的需求 3.愛與隸屬的需求 4.受人尊重的需求 5.自我實現的需求。

第五層	自我實現 (成功、成就、自由、被承認)---Self-Actualization
第四層	尊嚴 (追求自尊、社會地位、虛榮)---Egoistic Needs
第三層	歸屬感 (追求感性、社交合群)---Social or Belonging Needs
第二層	安全感 (免除危險、痛苦、憂慮、窮困)---Safety Needs
第一層	生理慾望 (食、衣、住、行、男女情愛)---Physiological Needs

(圖二)

最基層的就是生理需求，經濟環境與生理需求亦息息相關，如果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足，是無法要求一般人還能注重精神層次的提升。孟子說：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滕文公上）

<sup>32</sup>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九，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一九五》，新文豐出版。轉引參閱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九十三年），第一百零一頁。

<sup>33</sup> 張春興，《現代心理學》（台北：正大印書館，民國九十年），第二十頁。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梁惠王上)

一般人需有永久保有的產業，滿足了生理需求，對財富的累積，要有一定的數目，心理上才有所謂的安全感，然後才能有向善的心志，此與現代一句俗語相似：「先顧腹肚，再顧佛祖。」意思就是，先讓己生活無憂，才能有餘力虔心禮佛，先顧到現實物質生活才能進一步去經營精神生活以及道德實踐。孔子說：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篇)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篇)

錢財本身沒有罪惡，是我們人的內心促使罪惡的行為發生。如果百姓無法生活，就容易鋌而走險，貧窮容易造成更多的罪惡，所以孟子說：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悉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

民生經濟對百姓來說是相當切身，但安定的生活牽涉泛圍廣，由其政治制度與社會安定，是經濟發展的基石。私有財產可以讓一般人現實生活與心理得到穩定，是一般人進德修業所需的物質條件，雖然沒有必然性，有恆產不一定保證每一個人能進德修業，但是能夠減少因貧窮所帶來的社會問題。<sup>34</sup> 人民無恆產便無恆心，有恆產才能有恆心，對百姓來說，沒有恆產而言恆心，則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對政府(或對企業經營者)來說，能讓百姓(或員工)得到安定是首要的工作，「修己安人」是在上位者要優先考慮的目標。

## 第二節 義 與 利

### 一、價值上的義利之辨

「義利之辨」是儒家價值論的中心，對義與利有相當嚴格的標準，「義」對於一個人來說，是在外合理合宜的行為表現，關係一個人的人格尊嚴，因此孔子直接以君子與小人清楚地分辨說：

<sup>34</sup> 謝仲明，《儒學與現代世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民國八十年)，第二百零九頁。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篇）

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告子上）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篇）

生命雖然可貴，但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寧願犧牲生命而保有道德；道德價值比生命珍貴，是超越經驗界的。求生存是地球上每個生物的本能，連一隻小螞蟻都知道生命的可貴；死亡是每個生物所不願意的，意味著所有的美好都不見了，而世界上唯獨人可以跳脫出這樣的喜好與厭惡，可以選擇讓自己活得如行屍走肉或價值非凡，也可以讓自己死得輕如鴻毛重如泰山，人有這樣的良知良能，並不是只有聖賢才有，聖賢和我們每個人的良心都是相同的，是天所于我的。為了仁義道德可以捨去生命，名利財富和仁義道德比起來又有何價值呢？

## 二、志向上的義利之辨

陸象山曾經在白鹿洞書院講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當時天氣微寒，朱子聽了出汗揮扇，還有人感動到流眼淚的，辨志即象山的「義利之辨」，辨志，就是以道德意識出發，看是利己或利人的標準來使良心朗現，遮撥物欲、排斥意見，以決定自己做人的志向。陸象山說：

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sup>35</sup>

當時陸象山一番話，規勸讀書人讀聖賢書的目的是要自己能按聖人所教導的，不是反而拿來求官位的工具，要當君子儒，不要當小人儒。反思我們現在的

<sup>35</sup>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第二百七十一頁。轉引參閱蔡仁厚，《宋明理學—南宋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二年），第二百三十至二百三十三頁。

學校教育，不也是如此，大學失去理想也與現實脫節，原因是現在大學太功利取向，校園成了短視、功利的職業訓練所。<sup>36</sup>一般人常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凡夫俗子，不是富商高賈，頂多只能載浮載沉的做做生意而已，談仁義道德實在是太清高了，由於參雜了太多世俗的價值觀，反而磨損了大多數人的志氣與方向，也忽略本身的工作有它的意義與使命。教育的本質，著重在人格教育，先學會做人，才能學會做事。透過陸象山的辨志看現今的教育，更有一番舊雨新知的滋味，所以應把「善」往人的內心紮根，種下辨志辨義利的種子，是教育應該重新定位的焦點，使學生出社會扮演各種角色的時候，都還能清楚生命的方向。

### 三、事功上的義利之辨

孔子說：放於利而行，多怨。（里仁篇）

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盡心上）

孔子的意思是說，凡事都因為有利可圖才去做，把利益當作考量的要點，是會招來許多抱怨的。孟子也說：每天早上起來聽到晨雞鳴叫的時候，腦子裡所想的是今天要做什麼善事的人，是舜那一類的君子；假如早起滿腦子想今天要如何賺取利益的，則是盜蹠那一類的小人。史記 貨殖列傳 裡頭有這麼一句：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sup>37</sup>

說來說去，忙進忙出，還不是為了個利，儒家好像對「利」似乎沒有什麼好感，好似追求利益不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但荀子說過一句話：

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正名篇）

成就德行與成就事業，只是取徑不同，取徑不同不代表就是相斥的，只要謀的是人民的福利，求的是公眾的利益，合乎「義」，就是正當的途徑。董仲舒亦說：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義正即是利，而且是公利，是普遍之利，道明即是功，而且是大功，是長遠

<sup>36</sup> 《天下雜誌》，杜正勝，大學失去理想也與現實脫節，2005年3月，第一百四十八頁。

<sup>37</sup> 《二十五史--史記、漢書、後漢書》。開明書店編譯所，民國二十三年，第二百七十六頁。史記卷一百二十九，列傳第六十九貨殖篇。

之功；不謀其利是不謀求私利，不計其功為不計較一時的功效。儒家並沒有抹煞功利，只要求「利不背義」「見利思義」。<sup>38</sup>義與利的分別並非直接是公利與私利的二分，因為私利的追求也有可能間接與義務和公利相關，所以儒家不僅是利他主義，義、利與公、私利之分是有層次區分。就像儒家「以義為利」不同墨家的「以利為義」，雖然墨子講「兼愛」，但墨子不是要人透過個人的道德修養去培養兼愛的動機，而是把動力建立在外在的天志法儀價值標準上，這忽視了人性的差異性與特殊性，充分表現了其權威主義與功利主義，使人缺乏禮樂性情的陶冶。儒家義利觀正好相反，孟子說：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公孫丑上）

儒家推愛，愛有等差，是先親親、再仁民，而後愛物，不同墨家兼愛而無父。

#### 四、錢財上的義利之辨

我們對於財富的取得要有義利上的區別與先後，這關乎一個人的人格與志向，其實對錢財的對待與花用，也要有義利上的見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使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濟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雍也篇）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sup>39</sup>

孔子對錢財的使用有他的道理存在，不像墨家的「兼愛」，也不像楊朱一樣「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私有財產也是基本人權的一種，大富由天、小富由儉。孔子對每一份錢財的花用，都有它的意義，節儉是美德，但是錢財若能有意義地使用，流向更有意義的地方做更有意義的事情，社會經濟則能形成良好的新陳代謝循環結構。對錢財有義利上的觀念，心中才會舒坦，不容易讓錢財的得失與錙銖必較來擾亂我們的心志，錢財與我們日息相關，本身無罪，但人的欲望見著它，就想佔為己有，最好只進不出，所以不能忽視它的定位，要慎重地對待，取得它

<sup>38</sup> 見蔡仁厚，「道德上的義利之辨與經濟上的義利雙成」，《中國文化月刊》，第一四四期。

<sup>39</sup>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出版社，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六刷，第八十五頁。

不僅要乾淨合宜，支配它更要適度有義。

### 第三節 經濟行為的最終目的

#### 一、先庶後富、先富後教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孔子說：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篇）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篇）

沒有道德的經濟價值是一點價值也沒有，懂得羞恥惡惡是義的表現，義是合理正當的意思，方法要正當合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樣追求財富才有意義。《大學》裡有一句話：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一個有德行的人立業，是為了能因應人生的突發狀況以及免於生活上的匱乏。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有德之人以同理心提供了工作機會，幫助別人也能成家立業，基於這樣的信念，自然而然身旁就有很多人願意跟在他的身邊做事，大家同心協力奮鬥而產生財富創造事業。德是根本，財是末梢，假如相反，招集人馬的目的只是為了累聚自己的財富，則物以類聚，大家為財而聚集在一起共事，久而久之，便會因為私心計較，而互相爭奪。一個人不管出生的家庭背景為何，只有自己是最好的本錢，懂得調適自己培養自己的品德，才是掌握追求財富的智慧與要領。追求財富部份因素是時運，君子先正身，修己以安人，有能力以得人和，就能和氣生財，只要行得正，就算落到不好的時運，大家共體時艱，也能度過難關，所謂天時地利人和，而人和則是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

解決了經濟問題，不一定能夠解決行為問題，人民不一定能夠安份守己，社會安寧，解決經濟問題，只是解決行為問題的先決條件而已，在先決條件解決了以後，還要加以教育的力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篇）

一個國家，有眾多的人民，要使他們富有，過著富足的生活，人民富有了，要加以教育，不加上教育的力量，則優越的經濟條件，反成為助長作惡的資源。所以孔子亦說：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篇）

孟子也說：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可見教育的重要，這裡的教育，並非技術的傳授，而是教以人倫，教育每個人認識自己是一個道德主體，都有為善的能力。貪婪是最真實的貧窮，滿足是最真實的富貴，錢財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沒有人會嫌它太多，總是希望越多越好，所以經濟富庶不見得人民的內心也充實飽滿，經濟的最終目的如果只是得到更多的財富，那麼國民頂多是有錢的暴發戶而已，唯有教育的輔助才能提高人民素養，成為富而好禮的國家。

## 二、富而好禮、經濟自由

有一回子貢問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說：「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學而篇）經濟的最終目的不是數字上的多寡，而是在主觀層面上成為一個富而好禮的人，即人品人格完善的好人。《大學》：「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年輕時努力用自己的體力腦力追求財富，年老時再努力用財富買自己的健康，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只是為時已晚。自己才是真正的財富。儒家主張經濟自由，孟子說：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孫丑下）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公孫丑下）

當時商人徵稅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商人貪徒蠅頭小利，而且採取獨裁的手段，累積巨富，雖然利潤考量是從商的動機，合理的聚積財富是人的權利，但是獨裁壟斷就已超過界限，只好用制度法律來限制。今日常聽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滕文公上）這句話並不是說所有有錢的商人都不是好人，儒家反對

的是獨裁的富人，不是反對商業行為。孔子說：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篇）

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有共產的思想，而是在制度上能有非壟斷非獨裁的自由經濟，並且反對政府橫徵暴斂，一切應以安民為主要。儒家的經濟哲學稱為經濟的道德目的論(Moral Teleology of Economics)<sup>40</sup>，經濟的最終目的，皆是以道德為目的，也以道德為追求經濟的出發點是最實在的考量，所以，經濟行為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也有道德責任必須去擔負。

#### 第四節 儒與商

##### 一、從歷史的角度

雖然儒家對「義利之辨」有嚴格的價值觀，但是傳統儒家知名的人物，從孔子以來，就沒有人反對經濟上的活動或排斥正當取利的。孔子說：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篇）

該追求財富且是正當職業的，雖然只是駕車，孔子也願意做，如果是不可追求的不義之財，孔子寧願去從事自己興趣的事情。再說孔子門下「言語」科就有一個從商的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子貢除了有卓越的外交能力之外，就是善於貨殖。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公也長篇）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殖貨焉，億則屢中。（先進篇）

孔子讚美子貢像宗廟裡貴重又華美的盛黍稷之器，雖然不像顏回能安貧樂道，但是才識之明，能料事而多中，孔子肯定子貢，也從未否定子貢從商。史記貨殖列傳 贊曰：

七十子之徒，賜最饒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sup>41</sup>

<sup>40</sup> 參閱謝仲明，《儒學與現代世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八十年），第九章。

<sup>41</sup> 《二十五史--史記、漢書、後漢書》。開明書店編譯所，民國二十三年，第二百七十六頁。史記卷一百二十九，列傳第六十九貨殖篇。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子貢到每個國家都受人敬重，藉由商業活動，把孔子的道，傳播到社會國家各個角落，可見子貢是一個智者，經濟活動只是子貢創造價值的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做生意只是子貢生命的一個面向而已。因此民間流傳不知何時何人所做的對聯佳話：「經商不讓陶朱富，貨殖何妨子貢賢」<sup>42</sup>。《史記》的「貨殖列傳」則是以陶朱、子貢、白圭三人起首，稱為三大賢。歷史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使得「儒」與「商」是否背道而馳，已不言而喻。

## 二、從人格的角度

孟子說：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萬章上）

在孟子所舉的例子裡，儒家並無討厭商人，商人百里奚看重自己，對自己的生命尊重，不因為自己只是販夫走卒，而把自己的生命過得隨便。盡心於他的職業，為責任而責任，四民異業而同道，最後得到秦穆公的賞識，這是因為百里奚知道此生最有價值的是自己。雖然君子不追求永恆的財產，但是基本的生活需要，若無法從農耕取得，從商也無妨，自食其力，不假他人，其從商的動機是維護自己的人格與尊嚴。這裡的人格與尊嚴不是有錢有面子的尊嚴，而是人活著異於禽獸的那一點點的不同。經濟能夠獨立，對社會有貢獻而且也不會造成社會的負擔。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道德，要達到富而好禮的社會是要靠教育。

## 三、從職業的角度

古代社會地位就有士、農、工、商四民的分別，「儒」與「商」原本就是不同的兩項志業。王陽明曾在一五二五(乙酉)年，曾經為好友商人方麟寫了一篇墓表，方麟因為環境的關係由「士」轉業為「商」也是當時「棄儒就賈」較早的一個典型，方麟從商時也常把儒家觀念帶入商業的階層之中。在這篇墓表上可以見到儒家在四民論上的微妙變化。<sup>43</sup>王陽明說：

---

民國八十一年)，第八十頁。

<sup>42</sup> 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一年），第八十頁。

<sup>43</sup> 參閱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九十三年），第一百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sup>44</sup>

他在《重修山陰縣學記》中說：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sup>45</sup>

可見「盡心」兩字的重要性，王陽明的意思是任何職業的人若「盡心」於他的「業」即同為聖人之學，商人將本求利，在商言商不諱言利，按照規矩通貨財、販物資，以有易無，同為生生之道。盡心即憑良心做任何事情，通常我們說做生意要公道，商人要是沒有憑良心做生意，偷斤減兩，死了之後下地獄，要承受斷筋剔骨之刑，今世偷半斤，後世還八兩。姑且不論有無地獄，公道自在人心，是在商業活動裡，交易的信任基礎。

#### 四、從知識的角度

明朝時候的商人已經有用「賈道」這個名詞，表示當時的人們對商業有了新的看法，即在賺錢以外，還有其它的意義。除此之外，「賈道」又有另外一種意思，就是怎樣運用最有效的方法來達到做生意的目的。明清時代商人之所以對儒學發生興趣是由於他們相信儒家思想可以幫助他們經商，十六世紀的陸樹聲在「贈中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參政近松張公(士毅)暨配陸淑人合葬墓誌銘」中說：

士毅捨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積著之理，不屑纖細，惟擇人委任貲計出入。<sup>46</sup>

這裡的「儒意」不是指儒家的道德，而是指儒學中治人、治事以至治國的道理或知識，換句話說，儒士如何運用他們從儒家教育中所得來的知識以治理國家，商人使用同樣的知識道理來經營他們的商業。

儒家思想對商人的影響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指商人的一般知識和文化的修養，包括經、史、子、集各方面，由於這種修養必須通過儒家的教育才能取得，因此凡是受過教育的商人都可以說是具有儒的背景。第二層次則是儒家的道德規範對於商人的實際行為所發生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是關於商業倫理道德的部

---

零五頁。

<sup>44</sup> 《陽明全集》四部備要，中華書局據明謝氏刻本校刊。卷二十五。轉引參閱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九十三年），第一百零六頁。

<sup>45</sup> 《陽明全集》四部備要，中華書局據明謝氏刻本校刊。卷七。轉引參閱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九十三年），第一百零六頁。

<sup>46</sup> 轉引參閱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九十三年），第一百二十六頁。（陸文定公集卷七）

份，也是最為核心重要的部份。現代工商企業人都有受過教育，更應該明白雖然商業的本質，有提供工作，賺取利潤的功能，但留錢不如留德給子孫，儒家道德在功利主義為導向的社會裡，顯得更重要了。儒家不反對利，要見利思義、以義導利，把義放在優先位子。<sup>47</sup> 援儒入商更有輔助的作用，能夠道德上做到義利之辨，在經濟上達到義利雙成。<sup>48</sup> 歷史上中國商人的地位隨著每個朝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提及「儒」與「商」總覺得有些格格不入，商人並不排斥儒家倫理，只是「儒」與「商」就像道德與經濟，或義與利，或天理與人欲等等看起來似乎對立的問題，其實，不見得是相對立的，只是層次上看法的不同而已，所以「儒」與「商」不相悖、不相扞格，反而是相輔相成的。

---

<sup>47</sup>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民國九十三年），第一百二十九至一百六十頁。

<sup>48</sup> 見蔡仁厚，道德上的義利之辨與經濟上的義利雙成，〈《中國文化月刊》，第一四四期。